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廖显浪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多数学者仅从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的角度解释这一问题,认为制度障碍是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原因。本文在新兴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三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城乡经济发展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在劳动力流动限制条件下,多种力量综合作用可能使这一效果得不到体现。相关的实证分析支持模型的推理:我国劳动力流动确实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 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12)06-0046-07

A Study of China's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LIAO Xian-lang

(School of Economic,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urban-rural labor mobility scale and income gap expanded at the same time. Most researchers explain this problem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 of labor mobility in China.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neoclass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struct a 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c growth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lab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model shows that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a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labor mobility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u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ose forces may cause this gap wider. The empirical test shows that, in China, labor mobility exactly narrowe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ut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rban expanded it, and thus the labor mobility scale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expanded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labor mobility;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economic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12-06-21; 修订日期: 2012-08-30

作者简介: 廖显浪(1983-), 湖北孝感人,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发展经济学。

一、引言

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零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从而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许多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国内大多数文献研究的经验证据也支持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观点^[1]。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正如蔡昉指出,“如果说在理论上,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的话,在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并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种现象意味着一个理论悖论的形成^[2]”。

为什么我国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蔡昉、王美艳根据现行的调查制度不能覆盖“常住流动人口”,从而造成城市收入水平的夸大和农村收入水平的低估的事实,质疑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说法^[3]。然而,正如钟甫宁强调的,上述分析只能证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计算可能因城乡人口分组变化而夸大,但不能证明控制分组以后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该学者从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变化的角度解释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认为劳动力市场调节的作用有限^[4]。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变化只能解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部分,同样不能说明劳动收入差距缩小。因此,蔡昉提出的理论悖论仍然没有得到解释。

多数学者将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相悖归咎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李实指出,由于户籍等制度限制,贫穷地区外出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这些劳动力的流动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5]。沃利(Whalley)等人的一项模拟研究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6]。林毅夫等人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目前的迁移规模仍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7]。蔡昉的研究指出,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或地区差异的命题,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在理论上成立;只有那些人力资本水平很高,甚至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资本的迁移者才能够克服制度性障碍,才能够通过这种筛选,实现稳定的就业转换;其结果很可能造成迁出地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流失,反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8]。严浩坤等人通过将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看作劳动力流动的“准入门槛”,建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影响的模型,认为在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劳动力流动会扩大地区收入差距^[9]。

总体来看,研究者大多将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制度性障碍看成劳动力流动的“准入门槛”,假定只有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条件的劳动力才能越过这一门槛发生流动。因此,现阶段我国劳动力流动不仅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他们忽视了大规模普通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事实。我们无法判断,成千上万的在城市干着脏活累活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就比留在农村的农民高。因此,上述认识仍然是一些假说性的解释,尚未得到经验的验证。同时,蔡昉、王美艳通过对劳动力流动政策改革的回顾,认为中国劳动力流动是在日益减少的制度约束下扩大的,因而没有构成收入差距缩小的系统性障碍^[10]。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差距的现象呢?显然,多数学者仅从劳动力流动政策和制度的角度解释这一问题,而忽视了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复杂性。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不仅受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如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等)的影响,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考虑多种因素,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分析,才能对上述问题有全面的认识。本文将通过一个三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发展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城乡经济发展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借以加深对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解。

二、模型

以下基于新兴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构建一个三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发展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城乡经济发展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新兴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同时内生了劳动力流动与经济

发展，二者都是分工发展的结果。

1. 基本模型

新兴古典主义假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个人偏好多样化消费；消费品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从市场购买；每个生产者可以自由选择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和居住模式，即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有三种商品：商品 x 、商品 y 和商品 z 。其中，商品 x 和商品 y 为工业品，生产需要很少的土地，因此，其生产者可以选择分散居住也可以选择集中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商品 z 为农产品，生产需要大量的土地，农民必须分散居住在一个广大的面积上。将选择生产工业品的人称为 C 类人，选择生产农产品的人称为 R 类人。购买一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为 $1 - K$ ，交易效率为 K 。 K 的值与基础设施条件、运输条件和一般的体制环境等有关。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 K 不同， C 类人之间 $K = k$ ， R 类人之间 $K = r$ ， C 类人与 R 类人之间 $K = s$ 。由于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农户之间的交易相对于工业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较困难，所以假定， $r < s < k$ 。消费者 - 生产者总人数为 M 。

每一个消费者 - 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是：

$$u = (x + Kx^d)(y + Ky^d)(z + Kz^d)$$

每一个消费者 - 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是：

$$x + x^s = l_x^a, y + y^s = l_y^a, z + z^s = l_z^a, a > 1, \\ l_x + l_y + l_z = 1, l_x, l_y, l_z \in (0, 1)$$

个人预算约束是：

$$p_x x^s + p_y y^s + p_z z^s = p_x x^d + p_y y^d + p_z z^d$$

其中， x 、 y 、 z 表示三种商品的自供给数量， x^d 、 y^d 、 z^d 表示三种商品的购买量， x^s 、 y^s 、 z^s 表示该产品的销售数量； l_x 、 l_y 、 l_z 表示一个微观经济主体生产该产品的劳动份额，也代表生产该产品的专业化水平； $a > 1$ ，表示个人生产该商品具有专业化经济，个人生产该商品的生产率随着他生产该商品的专业化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p_x 、 p_y 、 p_z 分别表示三种商品的价格。

根据文定理^①，个人可以选择的生产模式有：自给自足（用 A 表示）；卖产品 i 且买产品 j ，用 (i/j) 表示，有六种模式： (x/y) ， (y/x) ， (x/z) ， (z/x) ， (y/z) 和 (z/y) ；卖产品 i 且买产品 j 和 t ，用 (i/jt) 表示，有三种模式： (x/yz) ， (y/zx) 和 (z/xy) 。

这些模式的组合产生了四种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结构 A ，所有人选择模式 A ；局部分工结构 $P1$ ，所有人自给自足 z ，并在 (x/y) 和 (y/x) 两种模式之间选择；局部分工结构 $P2$ ，所有人自给自足 y ，并在 (x/z) 和 (z/z) 两种模式之间选择（另一种结构 (y/z) 和 (z/y) 的组合与 $P2$ 对称，且产生相同的人均真实收入，故省略）；完全分工结构 D ，所有人在 (x/yz) 、 (y/zx) 和 (z/xy) 三种模式之间选择。

通过最优化求解，并根据市场出清条件^②，可以求得 8 种模式的最优化解，结果见表 1。其中， M_x 、 M_y 、 M_z 表示每种产品的生产者人数。从表 1 来看，除自给自足模式 A 外，其他模式的真实收入都与不同产品的生产者人数以及相关的交易效率有关。接下来讨论这些变量变化对真实收入的影响。

2. 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同一种结构的不同生产模式的生产者之间的真实收入将最终相等。根据这一效用均等化条件，可以求得四种结构的均衡解，结果见表 2。

① 文枚 1998 年在一组一般效用和生产函数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对“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的定理进行了一般性证明。杨小凯 1988 年在具体的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证明了该定理。该定理的详细证明见：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分析框架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5 - 107。

② 市场出清条件，要求市场上所有人对每种商品的总购买量与总需求量相等。

表1 八种模式的最优化解

模式	自给数量	专业化水平	供给	需求	真实收入
A	$x=y=z=3^{-a}$	$l_x=l_y=l_z=1/3$	—	—	3^{-3a}
(x/y)	$x=2^{(a-1)}3^{-a}, y=3^{-a}$	$l_x=2/3, l_z=1/3$	$x^s=2^{(a-1)}3^{-a}$	$y^d=2^{(a-1)}3^{-a}$	$2^{2(a-1)}3^{-3a}rM_x/M_y$
(y/x)	$y=2^{(a-1)}3^{-a}, x=3^{-a}$	$l_y=2/3, l_z=1/3$	$y^s=2^{(a-1)}3^{-a}$	$x^d=2^{(a-1)}3^{-a}$	$2^{2(a-1)}3^{-3a}rM_y/M_x$
(x/z)	$x=2^{(a-1)}3^{-a}, z=3^{-a}$	$l_x=2/3, l_y=1/3$	$x^s=2^{(a-1)}3^{-a}$	$z^d=2^{(a-1)}3^{-a}$	$2^{2(a-1)}3^{-3a}sM_x/M_z$
(z/x)	$z=2^{(a-1)}3^{-a}, x=3^{-a}$	$l_z=2/3, l_y=1/3$	$z^s=2^{(a-1)}3^{-a}$	$x^d=2^{(a-1)}3^{-a}$	$2^{2(a-1)}3^{-3a}sM_z/M_x$
(x/yz)	$x=1/3$	$l_x=1$	$x^s=2/3$	$y^d=1/3, z^d=1/3$	$3^{-3}ksM_yM_z/M_x^2$
(y/xz)	$y=1/3$	$l_y=1$	$y^s=2/3$	$x^d=1/3, z^d=1/3$	$3^{-3}ksM_xM_z/M_y^2$
(z/xy)	$z=1/3$	$l_z=1$	$z^s=2/3$	$x^d=1/3, y^d=1/3$	$3^{-3}s^2M_xM_y/M_z^2$

表2 四种结构的均衡解

结构	相对价格	售卖不同商品的人数	人均实际收入
A	—	—	3^{-3a}
P1	$p_x/p_y=1$	$M_x=M_y=M/2$	$2^{2(a-1)}3^{-3a}r$
P2	$p_x/p_z=1$	$M_x=M_z=M/2$	$2^{2(a-1)}3^{-3a}s$
D	$p_x/p_y=1,$ $p_x/p_z=(s/k)^{1/3}$	$M_x=M_y=M/[2+(s/k)^{1/3}],$ $M_z=(s/k)^{1/3}M/[2+(s/k)^{1/3}]$	$(s^4k^2)^{1/3}/2$

从表2来看,由于 $r < s$,结构P2总是优于结构P1。因此,可能成为均衡结构的只有A、P2和D。进一步比较三种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可以得到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结果,以及模型的均衡结构。

令 $u(A) = u(P2)$ 、 $u(P2) = u(D)$ 、 $u(A) = u(D)$ 得:

$$s_0 = 2^{2(a-1)}; s_1 = 2^{6(a-1)}3^{9(1-a)}/k^2; s_2 = 3^{9(1-a)/4}/k^{1/2}$$

比较 s_0 与 s_1 ,有: $k_0 = 2^{4(a-1)}3^{9(1-a)/2}$

当且仅当 $k < k_0$ 时, $s_0 < s_1$ 。此时,当 $s < s_0$ 时,结构P2优于结构A;当 $s > s_1$ 时,结构D优于结构P2。因此,当 $s < s_0$, $s \in (s_0, s_1)$, $s > s_1$ 时,均衡结构分别为A、P2和D。

当 $k > k_0$ 时, $s_0 > s_1$ 。结构P2总次于结构A和D。此时,当且仅当 $s > s_2$ 时,结构D优于结构A。因此,当 $s < s_2$, $s > s_2$ 时,均衡结构为A和D。

从上述结果来看,当 $k < k_0$ 时有如下几种情况。

(1) 当城乡交易效率比较低时,经济的均衡结构为自给自足结构A。此时所有人都从事三种产品的生产,没有农业与工业的划分;所有人都从事农产品生产,每个消费者-生产者选择分散居住在农村,也没有城市。这种结构类似于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

(2) 当城乡交易效率有所提高时,经济发展为局部分工结构P2。此时一部分人选择专业化生产工业品 x ,一部分人选择生产农产品 z ,出现农业与工业的划分,该经济体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工业品生产者可以居住在远离农民之处,也可以居住在农场的边界,但其将选择后一种居住模式以节省交易成本。这意味着,每一个半专业化的工业品售卖者将紧挨着一个半专业化的农民居住。因此,在结构P2中仍然没有城市。

(3) 当城乡交易效率足够高时,经济发展为完全分工结构D。此时,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两种工业品的生产者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将集中居住形成城市,出现城市与农村的划分。

总体来看,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以及城乡划分的出现都是分工发展的结果,而其中关键的变量是交易效率。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在结构D中,当劳动力自由流动时,城乡居民的人均真实收入相等。这一结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以及沃利等人的模拟结果一致。然而,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一条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成立;特别是,我国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存在较严重的限制。因此,接下来讨论劳动力流动限制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3. 劳动力流动限制与城乡收入差距

从上述分析可知,结构A和P2中没有城市出现,也不存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因此,笔者将集

中分析结构 D。

假定该经济体通过某种制度或政策，限制从事工业品生产的人数，工业品生产者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则令：

$$M_x = M_y = M_0 < M / [2 + (s/k)^{1/3}]$$

此时，城市居民的真实收入为：

$$u(C) = 3^{-3}ks(M - 2M_0) / M_0 \quad (1)$$

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为：

$$u(R) = 3^{-3}s^2M_0^2 / (M - 2M_0)^2 \quad (2)$$

显然，当 $M_0 < M / [2 + (s/k)^{1/3}]$ 时， $u(C) > u(R)$ ，城乡收入差距 (dis) 为：

$$dis = u(C)/u(R) = k(M - 2M_0)^3 / sM_0^3 \quad (3)$$

从式 (3) 可以看出，一定时期内总人口 M 为常数，城乡收入差距受到 M_0 、 k 和 s 三个变量的影响。进一步对三个变量求导，有：

$$\partial dis / \partial M_0 = -3kM(M - 2M_0)^2 / sM_0^4 \quad (4)$$

$$\partial dis / \partial k = (M - 2M_0)^3 / sM_0^3 \quad (5)$$

$$\partial dis / \partial s = -k(M - 2M_0)^3 / s^2M_0^3 \quad (6)$$

由式 (4) 可知， $\partial dis / \partial M_0 < 0$ ，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数量越多，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由式 (5) 可知， $\partial dis / \partial k > 0$ ，意味着城市部门交易效率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进一步由 (1) 式可知，城市部门交易效率越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因此，城市经济发展越好，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由式 (6) 可知，城乡间交易效率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结合式 (1) 和式 (2)，城乡间交易效率越高，城乡经济都得到发展，但农村经济发展更快，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不仅受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还受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能使这一作用得不到体现。

综合上述分析，对于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在我国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存在较严重限制的条件下，现阶段的劳动力流动已经发挥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由于城市部门经济相对农村的快速发展，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我国出现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

三、实证检验

下面运用我国 1997 ~ 200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1. 指标设置

从式 (3) 来看，本文的计量模型主要涉及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城市交易效率以及城乡交易效率四个变量。其中，交易效率指标没有直接计量的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选择包含这些变量的信息的代理变量来衡量，具体指标及数据如下。

(1)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 (dis)。用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之比来衡量。

(2) 劳动力流动指标 ($FNJY$)。根据研究的目的，主要考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用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等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数比上总就业人口数。根据理论分析，预期该指标系数的作用为负。

(3) 城市交易效率指数 (K)。该指数用以反映城市综合交易效率，预期系数为正。交易效率的值与基础设施条件、运输条件和一般的体制环境等有关。参考赵红军的研究^[11]，该指数此处为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教育等三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具体为城市人均交通和通讯消费 (JT)、人均教育消费 (JY) 和城市道路铺装面积 (DL) 三组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其中，标准化处理方法

为：每项次级指标数据的原始值除以该组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效率，城市一般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本来城市交易效率指数应该包含城市一般的体制环境变化的指标，但这一指标的数据难以获取；同时，市场化改革既提高城市交易效率，也提高城乡间交易效率，因而难以将其对城市交易效率的影响分离出来。因此，这里城市交易效率指数未包括城市一般的体制环境变化的指标。

(4) 市场化指数 (*Market*)。如上所述，市场化改革既提高城市交易效率，也提高城乡间交易效率。该指数包含 (3) 式中 *k* 和 *s* 的信息，笔者预期其发挥类似 *s* 的作用，因而仍将其包括进来了。此处借用樊纲等人的市场化指数指标^[12]。该指数是各省间市场化相对进程的比较，包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等 5 个方面、18 个分项指标。

2. 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 27 个省（省、直辖市、自治区）1997 ~ 2007 年的面板数据；不包括统计上城市化率明显较高的直辖市北京、天津和上海；西藏部分数据严重缺失，因而也未予以考虑。由于樊纲等人的市场化指数只有 1997 ~ 2007 年的数据，因此，我们选用 1997 ~ 2007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和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城市人均交通和通讯消费、人均教育消费和城市道路铺装面积三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数据来源于樊纲等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9 年报告》一书^[13]。

3. 计量结果

表 3 给出了计量分析的全部结果，所有计算均通过 EViews 6.0 版软件进行。Hausman 检验显示模型具有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所以报告的是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 3 计量估计结果

变量	(I)	(II)	(III)	(IV)	(V)
<i>c</i>	3. 382034 ***	3. 320269 ***	3. 058491 ***	2. 977583 ***	2. 192830 ***
<i>FNJY</i>	-2. 415553 ***	-2. 574112 ***	-2. 053832 ***	-2. 110022 ***	1. 490956 ***
<i>K</i>	1. 046727 ***	0. 869427 ***			
<i>Market</i>	-0. 316953 ***		-0. 215490 **		
<i>JT</i>			0. 169876 ***	0. 108697 **	
<i>JY</i>			0. 621963 ***	0. 620418 ***	
<i>DL</i>			0. 299281 ***	0. 255026 ***	
R-squared	0. 709183	0. 697903	0. 726901	0. 721923	0. 047736
Adj R-sq	0. 706205	0. 695848	0. 722209	0. 718114	0. 044508
F 值 (p 值)	238. 1690 (0. 000000)	339. 5990 (0. 000000)	154. 9098 (0. 000000)	189. 5175 (0. 000000)	14. 78809 (0. 000147)

注：*c* 表示常数项，***表示 $q < 0.01$ ，**表示 $q < 0.05$ 。

其中，方程 (I) 为主要估计模型，方程 (II) 的估计不包括市场化指数 (*Market*) 变量。结果显示，所有系数都非常显著，模型拟合较好，但包括市场化指数 (*Market*) 模型的拟合优度略好。考虑建立城市交易效率指数时，综合指数的系数与各分项指标可能不同，方程 (III)、(IV) 为分别用三个分项指标代替模型 (1)、(2) 的城市交易效率指数的估计结果。其结果与方程 (I)、(II) 一致。方程 (V) 为只包含劳动力流动变量的估计结果。

从方程 (I)、(II)、(III)、(IV) 的估计结果来看：劳动力流动指标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结果一致，说明劳动力流动确实减少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交易效率指数的系数为正，与预期结果一致，即城市交易效率提高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市场化指数包含 (3) 式中 *k* 和 *s* 的信息，其系数为负，

说明其提高城乡交易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占主导。另外,即便模型不包括市场化指数指标,由于城乡交易效率的作用原理与城市交易效率一致,基于城市交易效率指数的估计结果,也可以得出提高城乡交易效率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据此,本文可以证实前面提出的假说。方程(V)的估计不包括交易效率指标,结果劳动力流动指标的系数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研究认为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四、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不断扩大的现象。多数学者将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相悖归咎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化障碍,从制度障碍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我国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解释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仅考虑了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忽视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不仅受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还受城乡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能使这一作用得不到体现。实证分析结果也显示,我国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出现了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不断扩大的现象。

上述结论意味着,在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后,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向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不断扩大的现象与经典理论并不相悖。这一现象是我国渐进式经济转型过程中特有的现象:一方面渐进式改革导致城市经济发展比农村经济发展更快,另一方面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化障碍限制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由此,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城乡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减弱,城乡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

参考文献:

- [1] 朱云章.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J]. 江淮论坛, 2007, (6).
- [2] 蔡昉.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J]. 经济学动态, 2005, (1).
- [3] 蔡昉, 王美艳. 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学动态, 2009, (8).
- [4] 钟甫宁. 劳动力市场调节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10, (4).
- [5] 李实. 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 经济学季刊, 2003, (2).
- [6] John Whalley, Shuming Zhang. Inequality Change in China and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683, 2004.
- [7] Lin, Justin, Gewei Wang and Yaohui Zhao.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4, 52 (3).
- [8] 同[2].
- [9] 严浩坤, 徐朝晖.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差距[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 (6).
- [10] 同[3].
- [11] 赵红军. 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D].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12] 樊纲.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 [13] 同[12].

[责任编辑 冯 乐]